

共和国成长教育丛书

百花齐和主旋律

文学艺术

● 主编 邓先明 胡海 ● 王强军 朱峰 赵凌雁 著



中国物资出版社

《共和国成长教育丛书》

②7

百花齐放和主旋律

—— 文学艺术

王强军 朱峰 赵凌雁 ● 著

中国物资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花齐和主旋律——文学艺术/王强军,朱峰,赵凌雁著.
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10
(共和国成长教育丛书;27)
ISBN 7-5047-1555-7

I. 百… II. ①王…②朱…③赵… III. 文艺战线—成就—中国—当代 IV. I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9085 号

中国物资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98 字数:1800 千字 印数:1~10000
ISBN 7-5047-1555-7/G·0333
(全套 27 册)总定价:128.00 元

目 录

一、新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与现状	(1)
二、文艺方针与政策	(10)
三、中国当代文艺理论与思潮	(16)
四、文艺批评	(23)
五、当代小说	(29)
六、诗歌	(43)
七、永远的故乡——中国当代散文评说	(50)
八、当代中国戏剧文学	(57)
九、年轻美丽的综合艺术——新中国影 视	(64)
十、谱写时代的旋律——新中国的音乐	(77)
十一、驿路梨花几度春——曲艺	(89)
十二、古老艺术展新姿——绘画与书法	(100)

一、新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与现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已有半个世纪了。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继承和发展，中国当代文学伴随新中国走过了风风雨雨 50 年。从发展阶段上看，中国当代文学可以以“文革”为界，分为三个大的发展阶段。

开拓和发展期（1949 年—1965 年）

这一时期习惯上也称为“17 年时期”。这是一个新旧交替、除旧迎新的时期。这一时期内文学观念的发展和演变一方面反映了社会形态的根本变化，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文学形态和作家队伍的转变和发展。建国初期，作家队伍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即来自解放区的作家和来自国统区的作家。前者如赵树理、丁玲、柳青、周立波、李季、贺敬之等，他们亲自参加过革命斗争，具有解放区的生活经验，和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核心的文学观念，因而很快适应当时的社会转变，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品。如《三里湾》、《创业史》、《杨高传》等等。来自国统区的作家队伍在民主革命时期曾经创作了许多杰出的作品，而在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社会转变导致的创作断裂，使他们的艺术成就从总体上来

说没有超越他们历史上的巅峰。这一时期他们的代表和代表作有老舍的《龙须沟》、《茶馆》、郭沫若的《蔡文姬》、田汉的《关汉卿》等等。除此之外，当时的作家队伍中还有一个特殊的新起的作家群，如梁斌、杨沫、曲波、峻青、杜鹏程、茹志鹃、刘绍棠、丛维熙、王蒙等等。他们或来自革命队伍，或产生于新社会的土壤，对适应社会的转变也不存在困难，因而创作力也相当旺盛，代表作如《保卫延安》（杜鹏程）、《黎明的河边》（峻青）、《青春之歌》（杨沫）、《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王蒙）等等。

由于社会形态的根本转变，这一时期的文学观念相应产生了深刻地变化，具有许多现代文学时期所不具备的特点。

在文学属性上，强调文学服从政治路线、服务于政治需要；在创作方法上，采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随后又代之以革命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在形象的塑造上，遵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原则，以塑造新的英雄形象为中心；在表现主题上，以公私的对立冲突为基本内容。简单地说，注目社会运动、投身并直接表现社会重大变革、以英雄形象为中心，政治色彩强烈是这一时期文学风貌的总体特点。

以小说为例，人民革命的胜利使文学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文学史上，小说创作普遍追求重大的社会题材，追寻现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追求史诗性效果，表现大的历史过程和对英雄人物的崇尚。《六十年的变迁》、《大波》展现了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生活，《一代风流》要写出中国革命的来龙去脉，《红旗谱》、《播火记》试图写出中国农民觉醒奋斗的历史道路，《红岩》写的虽然不是一个长的历史过程，但它写的是全国解放前夕革命与反革命最后搏斗

中英雄群体悲壮的一幕，也具有史诗的性质。而柳青的《创业史》更以其恢宏的卷帙和高超的笔法集中表现了当时文学的这一特点。林默涵在《涧水尘不染，山花意自娇——忆柳青同志》中写道：这部史诗性巨著“以它气势的磅礴，描写的细腻，思想的深邃，对人物性格的生动刻画，特别是对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新型农民形象——梁生宝的塑造，赢得了广泛的重视和赞扬。”

柳青在《创业史》中全力描写的是处于巨大历史转折中的农村变革，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农村的诞生史、创业史。作者在广阔而深远的历史背景下，相当充分地揭示了中国农村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同时基于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特点的正确认识，着力表现了农村社会主义革命是怎样进行的。小说通过县、区、社三级党的负责人对互助合作事业的正确领导，梁生宝互助组的巩固和发展，灯塔农业社的诞生和成长，体现了党关于互助合作运动的积极领导、自愿互利、重点试办、典型示范的正确方针和方法，展示了“这一革命中社会的、思想的和心理的变化过程”（柳青为《创业史》撰写的《出版说明》），特别是通过梁生宝与梁三老汉、与“三大能人”、与改霞等多种矛盾的描写，展示了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丰富而复杂的历史面貌，显示了社会主义不可战胜的生命力。

总的说来，以小说创作为集中体现的 17 年文学时期，经过开拓和发展，出现了一批优秀的典范的作品和性格鲜明的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但是，大量的作品直接地把社会阶级分析的理论结论当作人物描写的现成规范，阶级规定性成为人物行动的依据，人物的个性逐渐被归到类的属性之中，

忽视了精神现象远远超出阶级范围的更为广泛的联系性，逐渐走向类型化、单纯化，其结果是文学流派的消逝。在越来越“左”的政治潮流的挟持下，文学观念日趋凝固、排他、自足、封闭，与文学多样化的审美特质和发展通达的需要，形成越来越尖锐的矛盾。文学日益失去了独立存在的地位，成了文学政治或政治文学，到了“文革”，终于陷入了空前的大危机之中。

“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年—1976年）

这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凋零和沉默期。在“批判文艺黑八论”、“铲除文艺黑线”的大棒下，黑白邪正被颠倒，是非曲直被混淆。专一的政治视角，片面追求文学的政治功能，使文学日益政治化、非文学化，文艺创作陷入僵化和虚假的境地，艺术上日趋贫乏、单调和模式化，“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和建国17年以来产生的各种优秀文艺作品被摧残殆尽，文艺园地一片荒芜，只剩下八个所谓“样板戏”。

1966年5月至1967年9月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理所当然地受到广大文艺工作者和人民群众的唾弃和反对。广大文艺工作者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在斗争中思索，于愤激中抗争，用直接的或间接的形式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斗争，创造了人民的、战斗的文艺，给荒漠的文坛带来了新的曙光。特别是天安门诗歌运动，敲响了“四人帮”覆灭的丧钟，预示着文艺的春天重新降临。

复苏和飞跃期。(1967年10月至今)

这一时期是中国当代文学经过建国后17年的开拓与发展，经过“文革”十年的沉默与凋零，冲破禁区、摆脱束缚，向着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突飞猛进的时期。思想解放的洪流冲决了个人崇拜、教条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荡涤着意识形态领域的污垢，中国当代文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不论在创作的数量还是质量上，也不论在主题的深刻性还是题材风格的多样性上，都是过去难以比拟的。当然，这一时期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独立的、封闭的时期，而是一个复杂的、联系的、开放的时期。各种文学现象和文艺思潮交叉渗透、互助影响。各种各样的作家选择各种各样的体裁去表现各种各样的社会生活和思想倾向。形成了丰富多彩，百花齐放的新局面。

“伤痕文学”是“文革”后最早出现的文学现象。它以刘心武的《班主任》为发端，以卢新华的《伤痕》为标志，正式形成一股不可扼抑的创作思潮。《班主任》引发了人们对习以为常而又极不平常的社会问题的思考。《伤痕》的问世则推动了人们对以往历史的批判。《伤痕》的作者以较为感人的笔墨描写了母女两代人在那个特殊年代里的生离死别，是“四人帮”的莫须有的“叛徒”罪名活活拆散了母女之间的感情联系，从而给她们两人心头烙下了伤痕。如果说女儿的出走就开始刺伤了母亲的心，直至临终，这种伤痕还难以平复，那么，作为女儿的王晓华，心头的伤痕也许更大更深。作者的立意很明显，是继续刘心武“救救孩子”的呼声去探究“四人帮”给青年人造成的心理创伤。在《伤痕》的带动下，大

量主题、题材、风格基本一致的“伤痕文学”涌现出现。如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张洁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冯骥才的《铺花的歧路》、《啊！》、陈凯国的《代价》等，以及长篇小说莫应丰的《将军吟》、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等。

此外，“伤痕文学”中有不少在描写人们身受灾难的同时，又反映了人民与黑暗的斗争。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堪称典范。其他如邓友梅的《话说陶然亭》等也都以不同方式反映了人民的抗争。

反思小说略晚于“伤痕文学”，但很快取代“伤痕文学”，占据了小说创作的重要地位。反思小说打破过去小说中描写人物关系的固有模式，真实地表现各种人物的命运，大大开阔了表现生活的视野，从新的角度去描写各种人物的命运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其中描写农村题材，记录农民命运的作家以高晓声最具代表性。他的代表作有《李顺大造屋》和《“漏斗”户主》等。其他如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刘真的《黑旗》、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等。

“反思文学”反映城市现实矛盾的主题，突出地表现在“右派”题材中。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在当时的人民群众中产生了较大的震动。其他如王蒙的《友人与烟》与《布礼》，通过对两个不同人物的塑造反映了“反右”扩大化是如何改造一个人的生活信仰的。从维熙的《泥泞》也是一篇同题材小说，描写男女主人公坎坷的生活道路。

“改革文学”是继“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之后出现的又一种创作思潮。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实施，一部分作家很快地从反思十年浩劫的政治历史原因中跨了出来，把眼光拉

到现实，谋求和探索祖国未来的发展。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受到热烈的欢迎，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改革的强烈愿望。改革触及了社会和思想的深层积弊，乔光朴义无反顾的悲壮感，表现了矛盾冲突的尖锐性和严重性。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围绕改革中的尖锐复杂的冲突展现各种人物之间的思想、道德、灵魂的撞击，在改革的大趋势中各类人物精神境界的变化，从而使人感受到时代潮流的巨大冲击力。贾平凹的《腊月、正月》显示出这类作品由反映事件的冲突向反映精神世界的深刻变化的趋势。

在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和随后的一系列作品如王蒙的《悠悠寸草心》、谌容的《人到中年》、张弦的《挣不断的红线》、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张抗抗的《北极光》中，最值得重视的是对“人”的重新认识和肯定。这种对“人”的思考和肯定激发了人性和人道主义的复活，它使创作取得了一个较大的跃进，竟然一度被文学界定名为“人的文学”，对以后文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当时从王蒙的“意识流”、张洁的心理描写、戴厚英的哲理抒情，到张辛欣、张抗抗等的作品对人们的心态刻画描述，人的心灵世界这一宽广纵深的第五空间得到了充分的展示，无不与此有着直接的联系。

随着“伤痕文学”的发展还成长起来一批特殊的作家，如王安忆、梁晓声、张承志、叶辛等，他们被称为“知青作家群体”，他们的作品被称作“知青文学”。他们经过“伤痕文学”的疯狂的渲泄之后，更多地转向对民族、对国家和人民命运的反思。事实证明他们的这反思是深刻的，他们的视野是开阔的。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准确地捕捉到知青们

的心理空白和对未来的迷惘。梁晓声的《雪城》则是知识青年最初返城的真实反映。张承志的小说创作对现实与历史相交融的审美把握，历史的纵深感与现代精神的汇合，产生他作品的总体象征性。《北方的河》中的那个“我”顽强不息的追求与北方奔腾不息的河流，从总体上象征着一种躁动不安、冲决阻力、进取不息的时代精神。

80年代中期以前，由于历史的渐进性发展给作家们留下了相对从容的思考机会，使他们中的多数人富于自信并且姿态优雅，其文学经历和创作思潮也相对完整、独立、清晰，因而形成了几个含义明确、相对稳定的文学名词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知青文学”等等。然而随着西方科技的大量引进，社会经济的空前的速度繁荣发展，商品经济逐渐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处于主导地位，这时候，文学也像社会生活的任何一个部分一样受到了价值规律的冲击。传统知识分子以理性方式影响社会的现象正在被商业性的歌星、影星、政治活动家的影响所取代。人们对真理、正义、价值、尊严感不再抱有浓厚的兴趣和崇高的信仰，代之以对金钱的崇拜和不择手段的攫取。大学不再是思想性生活的园地，而成为生活生产专门人才的“培训基地”、“速成班”。于是出现了“脑体倒挂”的术语和“原子弹”对“茶叶蛋”的无奈与感慨。正统的文学作品、文艺思潮不单单被读者扔到一边，接着也被作家放到柜子的底层，等待被进一步的忘却。知识分子面对思想文化领域一度出现的突如其来的空白表示了无言的沉默和孤寂的退守。意识流、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后现实主义、朦胧诗、后朦胧诗，都如寥落的晨星随着市场经济主体地位的确立而显得黯淡无光。与此同时，鲜

有政治色彩的集中表现娱乐功用的文化迅速占领市场。琼瑶、三毛、席慕容、汪国真以及后来被陆续重印的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等现代闲适小品风行一时，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金庸的武打小说被搬上北京大学的讲堂。曾使许多看惯和坐惯文学交椅的人为之忿忿不平了很久。

然而事实就是事实，经济基础的发展壮大不是作为上层建筑一部分的文学艺术可以左右得了的。当市场经济渐渐深入人们的生活和头脑，渐渐深入社会生活的内部，作为人类思想的精英的作家们也逐渐适应了他们周围的环境，开始以一种冷静而客观的眼光评价自己、评判身边的一切，并力图在传统的理论、道德、观念和现实的经济规律中找准自己的位置。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已经在摇旗呐喊，呼唤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的文学高潮的到来了。

二、文艺方针与政策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领导核心和人民群众集体利益的代表，当然不会违背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更不会像封建统治阶级那样把文学当作愚弄人民的工具，而是尊重事实，尊重客观规律，坚持文学为人民服务的政治方向，因此才有 17 年时期文学的繁荣发展。“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等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在全国推行一条要从根本上毁灭社会主义制度、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左”倾路线，贬黜无产阶级文艺，禁止一切中外古典文学优秀遗产。文艺界一片黑暗。粉碎“四人帮”以后，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文艺走上了复兴之路。80 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经济突飞猛进地发展，人们的思想也发生了深刻地变化，党的文艺方针和路线更注重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更加深入地推行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政策。同时注意积极主动地发挥文学艺术的宣传教化和精神鼓舞作用，文学艺术得到了自由而健康的发展。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毛泽东于1956年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的，在此之前，文学艺术经历了一个总结过去，适应新时期的过程。

1949年7月召开了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确定了新中国文艺的总方针，即以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总方针，确定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是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为全国文艺运动的总方向。大会要求文艺工作者努力学习，深入生活，继续贯彻普及第一、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的原则，有计划，有步骤地政策一切旧文艺，批判地继承和发展民族的民间的文学传统，积极开展文艺活动，创造出思想性和艺术性统一的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使我们的文艺运动能够更密切地和劳动人民相结合，更好地为人为服务。1951年，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1952年，周恩来在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闭幕典礼上讲话，深刻论述了戏曲改革工作中百花齐放与推陈出新、普及与提高、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团结与改造等问题。1953年召开了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和全国文学工作者代表大会。周恩来亲临大会作了题为《为总路线而奋斗的文艺工作者的任务》的报告，提出了文艺工作的新任务。周扬、茅盾、邵荃麟等分别作了报告，系统地阐述了发展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一些基本问题，如创作方法问题，人物塑造问题和加强文艺工作的领导问题等等。促进了文学的繁荣发展和作家队伍新生力量的顺利成长。

1965年，全国基本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大规模的急风

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知识界的政治思想状况有了根本改变。在新的形势下，毛泽东于1956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三月，中国作家协会召开第二次理事会议（扩大），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5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向文艺界和科学界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详细论述了这一方针提出的依据和贯彻执行这一方针的要求。

关于如何贯彻“双百”方针的问题，毛泽东明确指出：“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

“双百”方针的提出，为我国文艺界解放思想，繁荣创作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政策指导，因而迅速得到了文艺工作者的热烈响应。在执行过程中，“双百”方针遇到了来自“左”的和“右”的两个方面的阻力和干扰，但主流是好的，发展也基本上是健康的，整个文坛充满了生机盎然的春天气息。

1957年4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继续放手，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但是因为政治情况的剧烈变化，“继续放手”、“进一步贯彻”并未成为现实，仅仅活跃了一年的文坛被反右派斗争占领了。历史证明，文艺界的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

果”(《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58年春,中国作协书记处起草了《文学工作大跃进三十二条》,提出“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个创作高潮,三五年内实现社会主义文学大丰收”。作协各地分会随之纷纷召开“跃进”会议,制定“跃进”创作规划,一时颇为热烈。但是文艺“大跃进”终因严重违背艺术规律而未能实现。随后,1959年夏季又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文艺界一方面继续号召“创作大跃进”,同时又掀起一个批判“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浪潮。许多正确意见受到压制,并未做到通过百家争鸣深入探讨文学艺术的规律。

接下来是对文艺政策的一系列调整和新政治斗争的出现。

1960年7月,第三次全国文代会暨各协会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试图从建国十多年来的实际经验中探索出一条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正确道路来,但因处于“左倾”思想的指导下,仍然贯穿着对国内“修正主义思潮”的错误批判,并未达到预期目的。

1961年6月,周恩来发表著名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强调了发扬艺术民主问题,成为随后制定的《文艺八条》和电影工作三十二条的指导思想,决定进一步贯彻“双百”方针。

1962年,继续对文艺政策进行调整。周恩来、朱德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人民日报》于5月23日发表《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社论,将“为工农兵服务”扩展为“为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全体人民服务”。这是调整党的文艺政策的一项重大决策。遗憾的是,一场新的政治斗争风雨到